第三资料库的开发和“非遗”保护

陈真文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摘　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以民间文化为主的民族文化遗产。“第三资料库”是民间文化的“非遗”宝库。我国保护“非遗”工作成绩很大,但在实践中,对“非遗”的许多根本问题尚有不少模糊的认识,有的不同看法需要讨论研究,而不正之风的干扰和造成的不良影响,更是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

[关键词] “非遗”;第三资料库;根本问题;不正之风
[中图分类号] I026;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227(2015)04-0001-05

自从 200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以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已经超过 10 年了。国内外各国政府和民间团体都做了很多工作,我国已经参加“非遗”保护公约,并且正式通过了“非遗”保护法,这就使得保护“非遗”成为每个公民和干部的义务。文化部还公布了几批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有几千项重要的“非遗”项目得到了国家的重视和保护的资助。各地省级、县级的“非遗”保护项目也纷纷评选出来。虽然还没有全面介绍“非遗”原理的课程,但是,许多学校已经把剪纸、泥塑等等民间美术项目列入课程。

今年在“非遗”上有两件大事值得注意。一是“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字化工程”已经有了第一期成果,下面我将要详述。二是在“非遗”的研究方面,有重大的进展。最近我们在书店看到叶舒宪主编的“神话学文库”已经出了第一批重要著作。神话是最古老的民间文学之一,是民族文化的根基。许多西方大片和科幻作品出自神话。如《星球大战》《指环王》《哈利·波特》《阿凡达》《达·芬奇密码》《纳尼亚传奇》等等,数不胜数。我们的《西游记》《封神榜》《开辟演义》等等古典小说也正在开发。古代神话对当代文艺创作、影视动漫、网络游戏等等许多文化产业的建设具有极大的现实作用。人们对神话非常重视。但是神话学研究比较艰深,一般人了解不多。此次“神话学文库”一下子推出了 17 本书,真是令人大开了眼界。其中有对神话研究方法论的著作如《结构主义神话学》《神话与原型批评》《文化符号学——大小传统新视野》《20 世纪西方神话研究史略》,还有关于中国古典神话和神话人物的研究,如《中国神话母题索引》《玄武神话、传说和信仰》《伏羲神话传说与信仰研究》《蓬莱神话——神山、海洋与洲岛的神圣叙事》《〈山海经〉的神话思维》,一些人们期待已久的经典著作如《〈旧约〉中的民间传说》《苏美尔神话》《洪水神话》《凯尔特神话传说》《米诺王权与太阳女神》《日本神话的考古学》;还有《中国神话学百年文论选》《现代口承神话的民族志研究》反映了一个历史性的进步。过去的研究往往都是只对第一资料库的文献中的神话资料的研究,局限性比较大。而后者对现代口传神话的调查研究则是对第三资料库的开发,使我们看到了神话在民间流传的活态,这是一种对活的神话的立体研究,这种研究是历史的前进,值得我们特别的注意。

过去某些西方学者比较重视文人文化,竟然把文人文化称为“大传统”,反而把极其巨大的民间文化叫做“小传统”;把大众和小众搞颠倒了。叶舒宪教授提出了纠正,认为应该反过来把伟大的民间文化传统叫做“大传统”,把文人文化叫做“小传统”,这就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了过来。这是对西方中心论的荒谬理论进行纠正的科学创新,是非常必要的。当然,这也是我们在“非遗”保

[收稿日期] 2015-03-12
[作者简介] 陈真文,北京大学教授,北京民俗学会创会会长。

护的过程中,提高了文化自觉的一种表现,值得大书特书。

“非遗”保护的成绩很大,形势喜人。不过也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注意。

例如什么是“非遗”?为什么要保护“非遗”?中国保护“非遗”的历史情况如何?对这些根本问题都尚有不少模糊的认识,有的不同看法也需要讨论研究。

另外,在评选和保护实践中,也有不正之风的干扰,都是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本文就想对一些现实存在的重要问题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提出自己的一些新的看法,向大家请教。

“非遗”保护的几个根本问题

一、“非遗”是什么?要明确回答这个问题还真不容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公约提出的五个方面内容很多,不容易记住,人们往往根据报道得比较多的民间工艺品、民间音乐、戏曲艺术等等,认为“非遗”主要是那些内容。这当然是很不全面的。

2005 年文化部在苏州召开了“非遗”保护专题研讨大会,这是一次全国性的大会,由文化部长孙家正同志主持,有全国的 90 多名专家参加。后来出版的两本大会论文集中,北京大学段宝林教授的文章《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内涵》被放在第一篇,说明他的观点是得到大家普遍认可的。后来出版的一些“非遗”教材也采用他的观点。他的观点是怎样的呢?他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几十年来保护“非遗”的实践,发现所谓“非遗”,实际上就是以民间文化为主的民族文化遗产,其主要内容就是民间文化。我以为这个观点是比较清楚而明确的。

二、为什么要保护“非遗”?主要是因为民间文化往往流传在人民的口头,如果不及时记录、采集,很容易就会像风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因此,在世界现代化疾速发展的情况下,抢救民间口头文学艺术与民俗文化资料是非常紧迫的任务。因为这是人类几千年来创造、运用和积累起来的极其丰富而宝贵的民俗文化宝库——第三资料库,可以说是人类文化的基因库。从古今中外几千年的文化发展史来看,民间文化确实是人类各民族文化的根基,一切伟大的文人文化成果都是在民间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发展的。(参见光明日报 1987 年 12 月 15 日段宝林《文艺上的雅俗结合律》、2010 大众文艺出版社《民间文艺和立体思维》)故而保护“非遗”对人类新文化的建设和文化产业的开发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

文人们对第三资料库往往不够了解。记得前几年香港大学荣誉教授饶宗颐先生在北京论坛上说到中国文化遗产的丰富时,只提到了书面的文献资料和考古文物资料这“第一资料库”和“第二资料库”,而没有提及这非常重要的“第三资料库”。

这第三资料库就是民间文化的“非遗”宝库。如果不了解民俗文化,在研究中往往不能彻底,有时甚至出错闹笑话。例如国学大师钱穆在《黄帝》一书中说黄帝和虎豹熊罴一起作战是“驯服野兽”来打仗。这就是缺少人类学的基本知识,不懂图腾文化的结果。这显然是不符合远古的历史事实的。

三、对第三资料库开发的历史情况,往往就更不为人所知了。甚至一些专门研究民间文艺学史的专家也说不清楚。例如最近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冯骥才主编的《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字化工程全纪录》一书,介绍了“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字化工程(一期)”的工作成果的主要情况。这个工作非常重要,很有价值,但遗憾的是其中第一编“历史回顾”“历史的记忆”和“最初的收获”三节中,都是从四五十年代开始讲起的。他们似乎并不知道民间文学——第三资料库的科学开发工作,早在 1918 年初在北京大学就已经开始有不少人在自觉地进行了。

1918 年 2 月 1 日的“北京大学日刊”头版发布了蔡元培先生的一篇《校长启事》,内容是向校内外广泛“征集近世歌谣”,当时还发表了刘半农教授的《征集近世歌谣简章》,规定了采录歌谣的科学要求和规范。得到了李大钊、鲁迅、胡适之等等许多进步学者和朱自清、顾颉刚、常惠、林语堂等人的热烈响应。成立了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很快就收集到许多民间歌谣,天天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出来,因为数量太多,来不及刊登。1922 年又专门创刊了《歌谣周刊》,开始时作为北京大学日刊的副刊,后来独立发行。它在每星期一出版,一到星期一,朱自清等歌谣爱好者早早地就在传达室等着买《歌谣周刊》了。后来朱自清先生主要根据《歌谣周刊》的材料,1929 年在清华大学中文系开了一门“歌谣研究”的专题课,其讲稿后来由浦江清先生整理,1957 年在作家出版社出版。

蔡元培先生在国外游学多年,他主要学的是什么学科?一般人以为一定是教育学或是哲学,其实都不是。蔡元培先生在德国、法国主要是学的研究的西方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而人类学是研究第三世界的,所以是研究民俗文化的。(段宝林写的《蔡元培与人类学》一文对此有深入的考证,此文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的首次学术评奖中获得了唯一的一个论文一等奖。)

当时人类学家开发第三资料库,是比较先进的,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晚年都特别注意研究人类学,并且写了许多学术笔记和文章、专著。如马克思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1881—1882)和马恩全集的后面几卷的笔记资料以及著名的人类学经典《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

马克思、恩格斯、蔡元培这样的先进知识分子重视开发第三资料库,绝不是偶然的,这是他们重视人民文化、人民创造的先进思想的自然流露。

值得警惕的几个问题

如今把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1987 年后改名“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几十年来收集的民间文学资料进行数字化的加工,使得大家可以很方便地使用这些极其宝贵、极其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料,是功德无量的好事,但是,这样巨大的工程应该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来进行才好。如今的“历史回顾”从四五十年代开始说起,无视北京大学 1918 年蔡元培等人的历史功绩,实在有点说不过去,未免有一点浮躁。而科学却是马虎不得的。

如果不是只依靠少数人,而是广泛团结各方面的专家共同奋斗,可能错误和缺点会少一点。北京大学段宝林教授说,他也是这个“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字化工程”的专家顾问之一,可是从来没有得到通知去参加过一次研究讨论的会议,这就说明,在广泛团结不同意见的专家方面似乎还做得不够周到。

这个工程的第二专家是 1978 年兰州会议以后才改行来搞民间文学的。而段宝林教授是兰州会议上做主题报告的专家,在大礼堂讲《民间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作用》讲了两三个小时,受到热烈的欢迎,被人们认为是“敲响了新时期民间文学振兴的开台锣鼓”。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因为在 60 年代民间文学课下马风的形势下,段宝林教授是全国唯一坚持讲授民间文学课的人。当时在北大进修写博士论文的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李福清也系统听过他的民间文学课。钟敬文教授曾经在会上说他“有张志新精神”。

非常奇怪的是,这次的民间文学数字化工程的实际工作中,段宝林教授被完全排除在外,而在兰州会议以后才开始讲民间文学课的人却当了首席专家之后的第二专家。这就太匪夷所思了。简直令人难以相信。然而这是事实。

所以《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字化工程全纪录》中出现许多残缺和错误,就并不奇怪了。这可能还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做法没有完全肃清的缘故。

其实,在段宝林教授的著作中是全面论述了“非遗”——民间文学保护历史的。例如在段宝林教授的民间文学教材《中国民间文学概要》(1981—2009 第 4 版)和他主编的《中国民间文艺学》(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7、2007 第 2 版)等书中,都详细介绍了蔡元培和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在一二十年代保护和研究民俗文化的历史情况。如果广泛团结而不是全盘否定不同意见的专家,当然就不会像现在的《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字化工程全纪录》(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4 年)反映的这样残缺不全了吧。

据说此工程的首席专家是段宝林教授的“老对手”,凡是他主导的会都不让段宝林教授参加,这种作风似乎也太霸道了一点。段宝林教授既然是正式聘请的专家顾问,为什么就一次会都不能参加呢?怎么能这样进行国家项目的领导呢?这种学霸作风是不符合我们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的。当然也是不利于学术研究的科学性提高的。据说尽管首席专家把段宝林说成是老对手,而段教授却说:“我们不应该是对手,而应该是战友!”有一次段宝林教授要送一本自己的新作《立体文学论》给这位首席专家,可是这位号称专门研究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史的人,却不肯接受这本新著。他说不要,在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贺学军教授说:“我要!我要!”于是就给了贺学军教授。如此拒绝不同意见的研究成果,怎么能写出全面的中国现当代民间文艺学史来呢?太不可思议了。如今在这里出现历史错误也就并不奇怪了。

当然,矛盾有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早在 1984 年这位首席专家刚刚由文艺报调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来当头时,曾经在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要学习西方以研究民俗为主,段宝林教授提出不

同看法,认为还是应该以民间文学为主,同时研究民俗。(这本来是一个中和的意见。前两年此首席专家自己也说:“钟敬文晚年最大的错误就是用民俗学取代了民间文学!结果使民间文学成了三级学科。”他自己也认识到这是不对的了。)结果段宝林的意见未被他采纳,但在理事会和大会上却得到代表们的热烈支持。在选举中段宝林教授得票第二,这位首席专家比段宝林少了十几票。从此他就把段宝林当成“对手”,处处打击排挤。

又如 1986 年国际民间叙事研究学会的会长劳里·航科教授来华进行联合调查,并讨论民间文学的科学调查方法问题。段宝林教授正好提出了“民间文学立体性特征”和“立体记录”的新理论、新观点,要求参加讨论;而且他和贾芝同志是经美国丁乃通教授介绍参加国际民间叙事研究学会的第一批会员,这次自己的会长来华了,当然是一次学习和交流的大好时机。乌丙安教授给段宝林来信希望会员都参加接待工作。可是这位首席专家领导,大权在握,根本不让段宝林同他们的会长劳里·航科见面,更不用说发表意见参加讨论了。后来到广西进行联合调查,当然就更不让段宝林参加了。这位首席专家不让发表段宝林教授的立体性特征和立体调查的新理论、新观点,使这个非常重要的新理论、新观点未能在国际交流和民间文学普查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当然,一只手不能遮住天,压是压不住的。段宝林教授的《论民间文学的立体性特征》获得了《民间文学论坛》首次评奖的“银河奖”。2009 年前后,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的陈劲臻教授专门写了两篇长文研究段宝林教授的民间文学立体性特征和立体思维问题,认为是新中国民间文学理论中主要的理论创新。这已经过了十多年。

由于首席专家引进洋教条否定段宝林教授的正确理论。段宝林在文艺报上发表了《评一种民间文学新观念》对他进行反批评。在副标题中明确说是“商榷”的文章。这位首席专家当民协领导时照搬西方观点而提出的“民间文学新观念”,受到了段宝林教授的批评,如果真有道理,对于这种百家争鸣的“商榷”,当然完全可以而且应该进行反批评的。可是这位首席专家十几年来虽然发表了许许多多文章,但是却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对这项批评进行反批评。这充分说明段宝林教授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虽然进行不了反批评,不过却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不断对批评者进行无情的打击和排斥,完全把段宝林教授排斥在文化部以及和文化部有关的一切保护“非遗”的活动之外。这次数字化工程当然也不会例外了。这已经成了规律。广西的同志说,此人听说段宝林要来,就说,段宝林来,我就不来了。在贵州也是这样。

其实这些做法对段宝林教授并不会造成什么损失。段宝林教授在国内外专家的评审后,获得了中国文联的国家级大奖“山花奖”三次,并且获得了意大利人类学大奖“彼得奖”、英国剑桥世界名人研究中心的“20 世纪杰出人物”金奖,2013 年还被英国皇家艺术研究院聘请为荣誉院士。真正受到损失和影响的是“非遗”保护的工作。

这种宗派主义打击排斥,是对党对国家非常不负责任的“学霸”行为。这种不正之风对“非遗”保护的伤害之大是令人痛心的。段宝林教授 1994 年开始发起对中国民俗文化进行全面普查编印 35 卷本的《中华民俗大典》,在全国几百名中国民俗学会的专家共同努力之下,没有要国家的钱,进行调查编写,现已完成 21 卷,但是因为某些人的阻扰至今不能出版,很可能胎死腹中,这将是人类文化的极大损失。

在“非遗”保护工作中,这类情况屡见不鲜,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国家每年花了一二十亿元进行保护工作,参加了这些工作是有利可图的事,所以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就在一些单位大行其道了。这是文化部门的一种应该制止的不正之风,一定要认真对待。不然,说的是广泛团结,其实是宗派打击。“非遗”的保护工作是不可能做好的。

第三资料库——民间文化“非遗”宝库的保护和开发是大有可为的。在纪念文化遗产日的时候,我们要好好宣传“非遗”的基本知识,只有使人们真正认识到“什么是‘非遗’”、“为什么要保护和开发‘非遗’”等等基本问题,人们才能够自觉地去保护“非遗”、开发“非遗”。

另外,“非遗”进课堂,也是一个必要的措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已经做出了规定,这是非常正确的,可惜还没有真正全面落实,现在大中小学大多还没有设立“非遗”课程。所以段宝林教授写了一本“非遗”教材,却被某教育出版社退稿了,说内容很好,深入浅出,简明生动,但是因为还没有这类课程,所以不能出版。段宝林教授在中国文化报发表的《民间艺术应该是艺术教育的必修课》(2013.12.6.)也反映了这种情况。

在出版界也存在这类问题。我们中国民俗学会发动了全国各民族的几百位民俗专家,从 1994

年开始进行民俗普查记录,编辑 35 卷的《中华民俗大典》,当时我们没有要国家资助,但是出版社却一定要有资助才能出版,于是由出版社向国家出版局的出版基金申请资助。结果真使人想象不到,申请了三次,全被所谓的“专家”审评组否定了。不知道这是些什么专家,为什么对如此重要的“非遗”保护项目如此轻视呢?有一句名言说:“对民间文化的轻视是由于无知!”确实很对。只要对“非遗”——民间文化——第三资料库有起码的认识,就不可能如此否定这个极其重要的项目的。因为这是人类几千年来第一次全面地从民间记录采集民俗资料,这是几千年来中国各民族人民文化的集体创造,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绝不亚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等巨作。可是在所谓的“专家”的心目中,如此丰富如此重要的人民文化创造,竟然比《儒藏》要差得多了。(《儒藏》这个项目不仅得到了资助,而且其资助款额甚至超过了《中华民俗大典》申请数额的几百倍。)民间文化的价值被贬低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这些所谓的专家,思想学术都严重老化。他们只看到文人文化,看不到民间文化、民俗文化,甚至认为广大人民过去大都不识字,当然就没有文化,从而轻视乃至否定民间文化。这种陈旧的冬烘文化观,虽然早已过时,而在某些国家机关部门或学校中的许多知识分子专家心目中却仍然岿然不动。这当然是和当前保护“非遗”、开发“非遗”的神圣使命的要求背道而驰的。

从 19 世纪到现在,人类学家、民俗学家对研究、保护和开发“非遗”——第三资料库,已经做了许许多多工作,引起了马克思、李大钊、蔡元培、鲁迅、毛泽东等等先进人士的高度重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颁布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我们国家也已经通过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许多人还未真正理解,对许多专家和民众普及“非遗”知识确实还是当务之急。保护和开发“非遗”——第三资料库的任务看来还是任重道远!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ird Database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EHN Zhen-wen

(Chinese Depart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mainly about 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and specially focuses on folk culture. The Third Database is the treasure-house of folk cultural heritage. Our country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on the preserv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owever, there is also a fuzzy understanding on many essential matter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us,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it is urgent and necessary to discuss different views related to these essential matters and cope with the interference and harmful effect caused by the unhealthy tendencies.

Key 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Third Database; Essential Matters; Unhealthy Tendencies

[责任编辑　江　剑]